

書名：《民國詞集研究》

作者：朱惠國 余意 歐陽明亮

出版：中華書局

出版日期：2022 年 6 月

頁數：654 頁

以“民國文學”概念的生成拓展為橫坐標，以古典詩詞史的延伸承續為縱坐標，近年來，民國舊體詩詞的研究漸呈上揚之勢。一方面，學界在文獻、理論兩大維度上都頗有獻替；另一方面，也確實存在著“求數量輕品質、重立論輕考辨的不良傾向”（頁 20）。朱惠國先生主持詞學壇坫有年，在民國詞研究領域成果卓著。他與兩位年輕學者余意、歐陽明亮合著的《民國詞集研究》（以下稱“本書”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的又一優異成果，更不啻是針對當下某些粗疏浮躁學風敲響的一記清耳之鐘。

—

在蔣寅先生《清代詩學史》的讀後感中，我曾提出“下潛”之說，主要意指通過對文獻的深度把握去還原文學史的原生態，¹這是優秀學術著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徵，而在以民國詞集文獻作為切入點的本書中又表現得尤為突出。可略舉數例：

首先，南社驍將傅專詞一向頗受冷落，“湖湘文庫”本《傅熊湘集》僅據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所刊《鈍安遺集》收入其詞一卷 35 首，加輯佚亦僅得 44 首。拙著《晚清民國詞史稿》已經指出，實際上傅專詞見之《南社叢刻》者多達 159

1 馬大勇：《詩學史的下潛、遙望與有我之境：基於〈清代詩學史（第二卷）〉的討論》，《學術界》2021 年第 6 期，頁 117。

首,風格精悍雄奇者居多,絕非“纏綿哀豔,深沉綿邈”之類評語所能涵括。²今讀本書,方知傅氏詞另有一種兩卷鈔本,收錄其己酉(1909)至壬子(1912)的詞作,卷前有寧調元、高旭等多人題辭,並作者甲寅年(1914)自序及跋尾(頁65)。夏敬觀詞遠較傅專著名,然其晚年所作一向未能寓目,本書指出上海圖書館藏有兩種《映庵詞》鈔本,去其重複,共收詞82首,為1939年至1953年之作。這些鈔本的發現當然有助於對這些詞壇名手的全面把握與深入認知,諸家題辭、自序、自跋更可為把握其詞軌跡與特質提供較豐富的視角。

其次,1925年在北京依託“譚家菜”第二代主人譚篆青而成立的聊園詞社是民國時期的著名詞人群落,我在有關論著中曾將其列入近百年重要社團之一,然而限於文獻,僅能略勾勒其輪廓而已。本書則博搜旁引,不僅列出了總數多達37名的詞社社員,更依據其成員別集逐年鉤沉出聊園社集的詳細狀況。其中如乙丑(1925)冬首次社集正值東坡生日,夏孫桐、邵章、姚華、奭良等因有題《東坡笠屐圖》之作,這是清代以來一直頗為興盛的“壽蘇會”之苗裔,而一直罕見齒及;聊園詞社丁卯(1927)春之社集係以清詞人京城故居命題,舉凡納蘭性德之淶水亭、徐鉉之雙椿老屋、黃景仁之法源寺寓舍、陶梁之紅豆樹館、周之琦之雙柏堂、王鵬運之四印齋皆在吟詠之列,這又是慧眼別具、“腦洞大開”的風雅韻事。其庚午(1930)社集則取“庚午春詞”為主題,仿庚子秋詞之例,“選于唐五代宋詞凡十有四家,二十有三調,二十有九闕,依調擬作,不命題,不限韻”,雖然没能查檢得相關詞作,有此線索,也足以為“庚子秋詞影響史”添上寶貴的一筆。有了如此“下潛”後的文獻細節,一部“聊園詞史”也就栩栩浮出歷史的海面(頁184—190)。

本書第二編對於詞社的考證特見工力。在這一編裏,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不經見的蘇州六一詞社、上海新社、上海滄社等各具特色的詞學社團,不僅可以通過對玉瀾詞社的考證校正“林修竹組織玉瀾詞社”“寇夢碧參加玉瀾詞社”等一些誤解,更可以成批量地從藝文函授社、中華編譯社函授部、文學研究社等函授部社透見彼時詞學教育之一端(第二編第六章),從南社到蕙江吟社等

2 馬大勇:《晚清民國詞史稿》(武漢: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6年),頁291。

26 個報刊型舊體文社的活動去體會其“傳統與現代的二重特性”及其“保存國粹”思潮背景下的微妙態度(第二編第八章)。凡此當然都是極有啓益而醒人心目的。

本書第三編擇取潘飛聲、周岸登、楊鐵夫、廖恩燾、夏敬觀、盧前作為樣本對民國詞壇名家予以舉論,其間亦不少探驪得珠之“亮點”。其第三章副標題名為“楊鐵夫詞體創作的細節考察”,內裏也確多耐人尋味的“細節”。如楊氏于 1932 年曾油印一部《抱香詞》,既未請人題簽,亦無任何序跋,明顯是一部“徵求意見稿”。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及孔夫子舊書網拍賣品書影中,都有著毛筆批點的痕跡,或正其句法,或校其音律。正是在此指瑕糾謬的基礎上,兩年後楊氏才正式刊行鉛印本,此本較油印本詞作多出數倍,廣泛徵求題辭,而且對油印本詞作進行了大幅修改。書中詳舉《掃花遊》《無悶》二詞的初稿與改稿進行對照,那就可以直觀地看出,二詞皆修改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,幾乎接近推倒重來。後文再加上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所藏稿鈔本《抱香室詞存》,對某些詞篇三本對勘,從而使文中對於楊氏詞心之深探句句鑿實,具有無可爭辯的論斷力量。多年以前,我在校點《大鶴詞集》時嘗以諸本對勘,力圖以“原作”“改作”“又改作”“定作”等不規範的校勘用語還原大鶴詞的創作修改過程,並由此上探其“以詞托命”的心志,因而讀到本書這一章時即特有共鳴。只是我淺嘗輒止,沒有將這些文獻工作更多提煉昇華到理論層面,那就又多了一分自慚自責之心境了。

書末所附 162 位民國名家詞集之敘錄亦是精意用心之作,其價值絕不在正文之下。該敘錄中固多名家,而亦不少不大爲人所知者。如李孺《侖閨詞》,《敘錄》論定其爲遺民之屬,稱其“以情緯文”“有時爲表達不滿,毫不遮掩,不惜以粗鄙出之”(頁 489);又如張丙廉《聞妙香室詞鈔》,《敘錄》考證生卒年之餘,更指出其“集中不乏豪放之作,並多用《八聲甘州》《金縷曲》《水龍吟》《念奴嬌》……《水調歌頭》等詞調”,再引《解佩令·自題詞集》略窺其創作狀貌(頁 491);又如王渭《花周集》,《敘錄》提挈其作詞“取適吾性,必拘拘聲律奚爲者”之觀念與“以蘇辛爲典範,詞格俊朗”之特徵,更特別表彰其以“新時局、新事物、新詞語入詞”的“強烈的時代性”(頁 493),凡此皆要言不煩,極便學者。該

《叙錄》名單顯然基於朱惠國、吳平先生主編的《民國名家詞集選刊》，而所增七十余家尤多女詞人，如楊延年、姚倚雲、許禧身、王蘭馨、玉並、溫倩華、羅莊、姚楚英、溫甸、馬汝鄴、姚倩、姚茵、楊鍾虞等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女性詞在民國繁星麗天、跨入“後李清照時代”的嶄新樣態，並為後續的“民國女性與民國詞集”之專題研究拓夫先路。³

二

對於文獻作為學術研究基石的重要作用，我們怎樣強調都不過分，同時，“文獻態”如果能夠進一步昇華到“理論態”，⁴ 那當然更是學人樂於企及並孜孜以求的。本書的出發點在於文獻，但卻常常插柳成蔭，在理論層面上予人鑿井成市、水到渠成的驚喜。朱惠國先生所撰第一編《民國詞集的歷史考察》具有鮮明的總論色彩，其第一章首先提出並解決民國詞集的界定、分期與流變問題，將不到四十年的民國詞分為 1912—1927、1927—1937、1937—1949 年 9 月三個時期，並以詳實的資料與紮實的例證指出，“無論詞的創作數量、詞集的出版數量還是詞社的活躍程度”，第二期都堪稱民國詞創作的繁盛期，“如果與整個民國史相比較，這一時期與民國史研究中所謂的‘黃金十年’基本一致”（頁 33），這是極其簡切而又高屋建瓴的理論判斷。在劃定民國詞人群體的基礎上，朱惠國先生以專章特別關注“民國詞集的新內容與新風格”，將其分為“新型觀演詞逐漸興起”“新型詠物詞應運而生”“詞作特色主題的新景觀”“域外詞空前勃興”等四個主題分別予以論述。其中，“特色主題”之“新美人”歌詠又最能“體現社會氣象、思想觀念等的變化”（頁 87）。《沁園春》“詠美”發端于劉過，經清代董以寧、朱彝尊等而漸成風氣，但也不無墮入惡趣之嫌。朱先生不僅敏銳地指出陳栩開《沁園春》“詠新美人”系列之先河這一詞史事實，更以深湛

3 “後李清照時代”的概念由門下弟子趙鬱飛率先提出，見其《晚清民國女性詞史稿》（長春：時代文藝出版社，2019 年），頁 112。

4 此乃鍾振振先生之提法，見其為李遇春《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編年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21 年）所作序，頁 7。

的文獻工夫鉤沉出陳小翠、陳次蝶、季娣、春夢、顧佛影、顧清瑤、張晉福、金兆豐、王渭等多家和作，再以林修竹、閻普通武等詞作衍為餘波，從而速寫出民國詞苑這場“豔體詞的自贖”的初步輪廓。

朱先生長期參與並主持《詞學》編務，對於詞學刊物與詞業發展的關係極多體驗與思考，故探論“民國詞集與現代詞學刊物”這樣的專題肯定是不二人選。本章別辟蹊徑，僅以《詞學季刊》的“詞壇消息”欄目為小切口，從詞壇動向、詞社活動、詞集編纂等三個方面展開討論，很好地導向了詞學刊物“在現代詞學構建中的作用與地位”的大目標，其中若干小細節的揭示尤其意味深長。如1933年8月，《詞學季刊》第1卷第2號“詞壇消息”刊發的《匯刻〈全宋詞〉及〈詞話叢編〉之擬議》之末尾，編者特加一句“茲事體大，非同人財力所能勝，世倘有願任刊印之責者乎？馨香禱祝之矣”，又如1935年7月第2卷第4號“詞壇消息”稱唐圭璋將所輯《全宋詞》先交國立編譯館印布草目，意在“廣徵海內詞學專家及藏書家之批評與補正”，末尾有“事關趙宋一代文獻，想亦海內學者所共樂助其成也”之語。細味此類看似客觀的新聞報導用語，當能看出其中包含的拳拳之意，從中也確實可見“《全宋詞》從醞釀到推進，再到最後完成，《詞學季刊》始終都參與其中，確實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”（頁123）。如此論斷手眼，真有“草蛇灰線”之妙，所謂“驟看之有如無物，及至細尋，其中便有一條線索，拽之通體俱動”。⁵

第三編“民國名家詞集舉論”也多有此種自文獻態上升至理論態的精彩篇章。其第五章論夏敬觀“學人而兼詞人”之觀念，至第三節則筆鋒一宕，轉談“近世學術體系轉型下的學人之詞”。文中特別指出，隨著中國學術體系逐漸走向現代，以龍榆生、夏承燾、唐圭璋為代表的新一代學人紛紛登上詞壇，他們和王鵬運、朱祖謀、夏敬觀等傳統學人的思想觀念已有很大不同。如夏敬觀與龍榆生對於“學辛”的不同態度，“表面上是對學詞門徑的不同見解，其背後折射的則是新舊兩代學人在文學的功能、意義等觀念上的差別……正體現出傳統‘學人之詞’向現代‘學人之詞’的轉變軌跡”（頁440）。該編前五章所論潘

5 陳曦鐘等輯校：《水滸傳會評本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），頁20。

飛聲至夏敬觀大體上是較傾向于傳統的詞人，殿末的第六章所論“試為詞體開新路”的盧前則是深具民國氣質的一員飛將軍。其《中興鼓吹》不僅與國族危亡、全民抗戰的大歷史語境高度密合，具有純粹的詞史品格，而且，在詞體創作手法、內容、用韻、入樂等方面，盧前也表現出了極其鮮明的革新意識。因而，作者在結尾部分歷舉夏承燾、龍榆生、林庚白、李冰若諸家關於詞體革新的思考，並給出這樣的結語：“舊體文學的改革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，盧前所遇到的這些問題，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，不過，盧前的《中興鼓吹》畢竟是一次可貴的‘試驗’，它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暴露出的問題，都對當今詞壇有重要的啓示意義”（頁 466）。如此縱橫捭闔，議論風發，接續傳統，關切當下，這才是正中“民國”這一特定歷史時期詞史研究鵠的之上乘佳作。

這部《民國詞集研究》精彩處尚多，非此一篇小小讀後感可以盡說，而讀時略有不愜意處似還可嘮叨兩句。本書敘錄 162 家民國詞人已堪稱廣博，不應再求全責備，然而如顧隨為“民國四大詞人”之一，其十個詞集中有九個刊於民國時期，此書未論，此闕失令人頗覺遺憾；⁶又如鄭騫為顧隨相交莫逆之“燕京小友”，亦是掉臂獨行的顧氏在當時詞壇為數極少之同路人，其“真率自然，平易曉暢而又富於才思”之詞風大抵受顧氏影響而得來，⁷敘錄倘能揭櫫之當更佳；又如左又宜《綴芬閣詞》大抵剽竊而成，似也應于正文及敘錄中有所體現。⁸當然，比之全書令人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接的閱讀快感而言，這些只是“責備於賢者”的白璧微瑕。我與學界同道一樣，都熱切期待著朱先生及其團隊鼓勇精進，早日推出“民國女性與民國詞集”“民國詞集的刊刻與傳播”等專題，從而為民國詞研究拓開一條更富新意、更具深度、也更加廣闊的路徑。

（作者：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 馬大勇）

6 顧隨之為“民國四大詞人”之一係我個人看法，見拙著《晚清民國詞史稿》，頁 455。

7 馬大勇《百年詞史 1900—2000》（即刊）於此有所論列。

8 見趙鬱飛《晚清女詞人左又宜〈綴芬閣詞〉剽竊考述》，《文學遺產》2019 年第 3 期。徐燕婷在《文史知識》2022 年第 9 期發文《涉嫌剽竊的晚清女詞人左又宜》提及此事，可看作是對本書敘錄的一種補充。